

我国女性社会组织成长的历程分析

——基于组织生态学视角

文/曾 静(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0091)

内容提要: 我国女性社会组织的发展经历了巨大变迁,但鲜有数据对这一变化轨迹进行统计分析,探究其背后的变化机制。通过搜集 1980 年—2018 年 39 年的女性社会组织相关数据,从组织生态学视角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究组织成立影响因素:首先,女性社会组织的成立率与组织种群密度的变化紧密相连,两者随时间变化呈倒 U 型曲线;其次,资源环境对组织成立率具有一定影响,结果显示政府支持力度对组织成立影响显著,女性社会组织成长对政府支持存在依赖性;最后,制度环境也是影响组织成立率的影响因素,其中法律法规的支持对组织成长具有显著作用。

关键词: 女性社会组织 组织生态 种群密度

中图分类号: D44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6323(2022) 02-048-12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的传入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中国的妇女权益保障开辟了道路,进一步引发了社会关注,推动了思想变迁。新中国成立以来,以“为妇女服务”为宗旨的女性社会组织不断发展,妇女权益逐渐得到保障,妇女地位大幅提升。女

性社会组织是实现妇女需求的重要载体,在推动男女平等,促进女性有效表达利用诉求,提高自身利益整合能力方面意义非凡。至今,在现实及政策的双重变革下,妇女需求不断变化与扩张,代表不同阶层利益、扮演不同职能角色的女性社会组织应运而生。

随着女性社会组织的多样化发

[作者简介] 曾静,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 2022-02-28

展,学界对其关注程度也在不断上升,不少文献涉及对女性社会组织的相关讨论,但主要集中于对妇联组织的改革分析、单类型女性社会组织描述分析及组织发展制度环境分析等,缺乏整体全面的分析统计。第一,已有文献缺乏实证性分析。大多数文献没有通过全面分析勾勒出女性社会组织的长期发展状况,仅通过背景性资料简要谈及,鲜有量化的系统研究。^[1]第二,研究缺乏准确性。现有的不少文章分析了女性社会组织的设立的制度因素,归纳了相关规范性行为准则、宪法秩序及法律、政治、经济制度安排等妇女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2][3]}然而,这些相关关系并未得到实证检验,多为主观分析,缺乏准确性。第三,研究缺乏理论铺垫。分析女性社会组织的文献大部分提出了应然性的建议而缺乏实然性分析。并且,文献常常缺乏理论框架,以组织生态学为基础的研究更为少见。女性社会组织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变迁历程,引入组织生态学的视角能够挖掘出影响其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对于推动女性社会组织研究意义重大。

以上三个问题使得现有研究难以突破对女性社会组织的碎片化分析,进而推动本文走向系统化的实证研究,采用组织生态学(organizational ecology)作为理论基础,通过时间轴线,收集了女性社会组织(1980年-2018年)的成立率。同时,基于已有研究收集了在该时段影响女性社会组织的多个连续性宏观变量,作出初步假设,以期找出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因素。文章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统计模型对女性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检验命题假设。并主要总结组织生

态学的相关理论并分析女性社会组织的成立率与理论的关联性。

二、组织生态学视角下的分析框架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组织生态学主要通过借鉴多学科知识,结合新制度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等理论来研究组织个体、组织之间及组织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4]经过40多年的发展,组织生态学获得了较快发展,对组织理论的发展起到极大推动作用。截至目前,组织生态理论体系主要包括对种群生态过程、组织设立与组织密度及组织设立的制度因素分析,本文聚焦于对种群组织的设立与组织密度和制度因素的关系研究。

(一) 组织与种群

1977年Hannan和Freeman首次提出“种群”(population)的概念,指出种群是由在一个特定边界内的、具有共同形式的所有组织构成的集合体。^[5]“种群”的概念来源于生态学理论,认为种群中的组织与生物相似,存在竞争、淘汰与死亡的过程。已有研究集中于对“组织成立率”及“组织死亡率”的分析,探索组织与种群的关系。Delacroix和Carroll提出组织的设立受种群内部成员数量的影响。同时,组织死亡率会影响下一阶段种群的密度,这使得“组织成立率”与“组织死亡率”通过种群形成了一个相互影响的作用机制。^[6]在后续的理论发展过程中,对两者的讨论逐步分化,一是聚焦对群体动力的研究,关注种群中既有组织的状况对潜在的进入者的影响;二是探究组织死亡率与组织生态位、组织年龄及规模的关系。

(二) 密度依赖理论

密度依赖(density dependence)是指在种群形成初期,其密度的增加会有利于组织合法性地位及社会资源的获得。当发展到一定阶段,该种群作用则会被认为不可或缺,并为社会所习惯和提倡,这种合理性现象有助于提升整个群体的生存状况,降低内部成员的死亡率,并且吸引更多犹豫者加入其中。然而,随着种群规模的继续扩张,组织生态位不断受到挤压,超出了组织环境的承载能力,成员间的竞争将会阻碍种群的发展,组织成立率逐步降低。依此得出,组织设立率与种群的密度在统计模型中呈倒U型曲线。^[7]

(三) 组织成立与制度因素

在组织生态学理论提出以前,组织理论集中于对组织内部的运行机制进行讨论,忽略了种群及组织以外的宏观分析。新制度主义主张制度因素对组织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组织存在于“制度环境”之中。^[8]组织并非是在经济学中仅追求利益与效率的群体,在实际中往往采用并非理性的组织方式以符合制度规范。随着理论发展,组织生态学开始融入新制度主义内容,组织发展开始考虑制度环境因素。制度环境对组织成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是制度环境对组织的直接影响,如通过法律法规强制提高组织的设立门槛;二是制度环境的间接影响,即通过影响种群的密度而间接作用于组织的成立。

(四) 制度环境分析

20世纪80年代Zucker对组织生态理论长期忽略制度环境进行了批判,^[9]这一批判促进了组织生态学研究将制度环境因素纳入变量范围,并开始进行标准化测量和计算。诺斯和戴维斯指出,从纵向来看制度包括规

范性行为准则、宪法秩序和制度安排,其中宪法秩序和规范性行为准则即“制度环境”。Scott将制度环境划分为三个维度——规则性、规范性及认知性维度,其中规则性主要指法律法规,规范性指社会规范及习俗,认知性指文化及话语等。^[10]在组织生态学中,多维度测量制度环境维度已成为趋势,但现阶段对其测量主要集中于对规则性维度的测度,即以法律法规数作为具体变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此,本文将认知性维度作为另一变量纳入其中,测量妇女在公共话语中的关注程度,促进指标体系的完善。

三、女性社会组织成立率的影响因素

基于上文,组织种群、组织成立与密度依赖及组织变化的环境扰动因素是组织生态学研究的重点。组织生态学最早运用于商业组织的研究,如1987年Carroll研究美国七个城市报纸出版企业的历史,揭示了其密度波动状况及设立的影响因素;^[11]同年,Barnett和Carroll对电话业进行研究,提出政府规制对组织设立产生的显著影响;^[12]此外,Pherson分析了志愿者协会的发展问题,主要集中于生态位重叠及竞争的研究。^[13]组织生态学视角下的女性社会组织研究较为少见,鲜有学者探讨密度依赖机制对女性社会组织的影响。

基于现有研究,将女性社会组织的成立率与密度依赖连接具有创新性,一方面可以归纳组织的演变规律,另一方面可以检验理论的适用性。另外,在中国较为集中的社会政策背景之下,女性社会组织发展同属于一个组织环境与制度环境,这是组织种群研究

的基础和前提,此背景下宏观数据的收集也更为便捷。中国的女性社会组织自身的特点也要求研究者充分考虑全国层面的因素,由此将女性社会组织视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群体。最后,将组织生态学视角引入组织研究,有益于探索我国女性社会组织发展的动力来源。第一,这一视角将已有的基于描述性并较为模糊的研究转变为定量的且精准的研究,为女性社会组织的发展历程提供实证支撑。第二,组织生态学视角能助力探索女性社会组织的发展动力,将组织设立与不同历史时期的动力因素相互联结。同时,对于组织成立率的探讨也能将女性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清晰显示,为组织的发展趋势作出进一步的预估。第三,已有研究虽已探索女性社会组织的成长因素,但均未考察结构性因素具体怎样影响女性社会组织的设立,建立的联系较为微弱,也缺乏科学性。由此,在文献及理论的支持下,以中国女性社会组织为具体的研究情景,提出假设。

假设1:密度依赖假设。女性社会组织的总量与组织的成立率呈正相关。但这种正相关的边际效应会随着组织密度的持续增长而降低。在这里“组织密度”,即上一年既有的女性社会组织数量,与“组织成立率”,即下一年组织的成立个数,存在倒U型曲线。

假设1a:女性社会组织的总数与女性社会组织成立率呈正相关

假设1b:女性社会组织的总数的平方与女性社会组织成立率呈负相关

假设2:资源依赖假设。资源环境和组织成立率之间存在相关关系。组织容纳能力强,资源充沛,则组织生存空间较为优越。随之,组织的成立率也会增长。女性社会组织

的组织环境主要由三个彼此相连的因素构成: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用私营企业数表示)、政府扶持力度(民政事业支出表示)、妇女人口资源(妇女人口总量表示)。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逐步削弱,部分资源从政府的垄断中流出,为女性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生存空间,也就是说市场体系的建立为女性社会组织提供了经济支撑。女性社会组织的发展程度与政府的扶持效果息息相关,政府对女性社会组织的财政支持力度增强能够孵化出更多的女性社会组织。由于缺乏针对女性社会组织的统计数据,本文采用民政事业支出(包含对女性社会组织的支持)代替女性社会组织的财政投入。妇女人口的增长一方面能够扩大女性社会组织的“建设主体”与“消费群体”,另一方面妇女人口数量的增加也带来了更多的妇女相关问题,为女性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现实条件。根据三个影响因素可提出以下分假设:

假设2a: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与女性社会组织的成立率呈正相关

假设2b:政府扶持力度与女性社会组织的成立率呈正相关

假设2c:妇女人口总量与女性社会组织的成立率呈正相关

假设3:制度环境假设。制度环境与组织设立率存在相关关系。符合制度规范的组织形式更容易生存。由于规范性维度主要体现在社会规范及习俗层面,难以精确测量,因此本文将女性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聚焦于规则维度和认知维度。前者指社会组织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法律政策的保护(因针对女性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较少,本文用社会组织法

律法规作为替代变量),后者指“妇女”“女性”等词汇受主流媒体的关注程度,当我们频繁关注妇女,通过主流媒体来宣扬妇女社会地位或解决妇女问题,相关词汇出现的频率会相应提升,并为大众所熟知。由此可以将假设3分为:

假设3a: 妇女权益保障相关法律数量的增长与女性社会组织成立率呈正相关

假设3b: 主流媒体对妇女的关注与女性社会组织成立率呈正相关

四、数据与变量

依据假设的内容,数据的收集也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1980年-2018年女性社会组织历年的成立率,1980年-2018年女性社会组织历年的种群密度;第二,1980年-2018年全国私营企业数、民政事业支出及妇女人口数量;第三,1980年-2018年女性社会组织制度环境因素:规则维度及认知维度的历年变化情况。第一部分的数据收集,笔者主要参考了中国社会组织服务平台上有关女性社会组织的数据,由于女性社会组织类型繁多,本研究将关键词限定在“妇女”“女性”“女企业家”“农家女”四个词,平台提供了各类女性社会组织的设立时间及组织总量。以关键词搜索的形式不免将少数女性社会组织排除在外,但以上四个词汇占据了女性社会组织的大部分,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对于部分信息缺漏的组织,则采用网页搜索的形式予以补充。结合收集到的数据资料,整理得出1980年-2018年女性社会组织种群规模的历年变化(图1),以及1980年-2018年女

性社会组织历年的成立率(图2)。

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女性社会组织在近40年的发展呈凹型曲线,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0年-1990年)组织萌芽期,女性社会组织数量上升缓慢,年均增长数量仅略大于三个,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下尚未形成较高的合法性地位;第二阶段(1991年-2010年)组织稳步发展期,女性社会组织数量较上一阶段提速加快,呈稳步增长态势,种群扩展明显,可以推测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组织合法性地位得到提升;第三阶段(2011年-2018年)组织快速扩张期,该时期女性社会组织的数量呈爆发式增长,仅2014年就增长高达218个女性社会组织,几乎是2000年之前所成立的女性社会组织总数。

从图2可以看出,1980年-2018年间,我国女性社会组织的成立率波动较大,经历了多个峰值。其中较为明显的是1991年、1995年、1999年、2004年、2014年,前四年虽然存在峰值变化,但相对波动较小,而2014年的峰值变动很大,最终使得女性社会组织的成立率呈倒U型发展趋势。女性社会组织在经历长时期的波动以后,其成立率在2014年达到顶峰,组织合法性在这一时期得到高度承认,新的组织密集进入种群;而到2014年后,组织的成立率有所下降,但总量仍在上升。通过图1及图2可以看出女性社会组织的成立率基本符合密度依赖理论,但并非完全契合,如在1991年到1994年期间,组织密度在稳定增长,但组织成立率却呈下降趋势,这一现象促使我们开展进一步的分析与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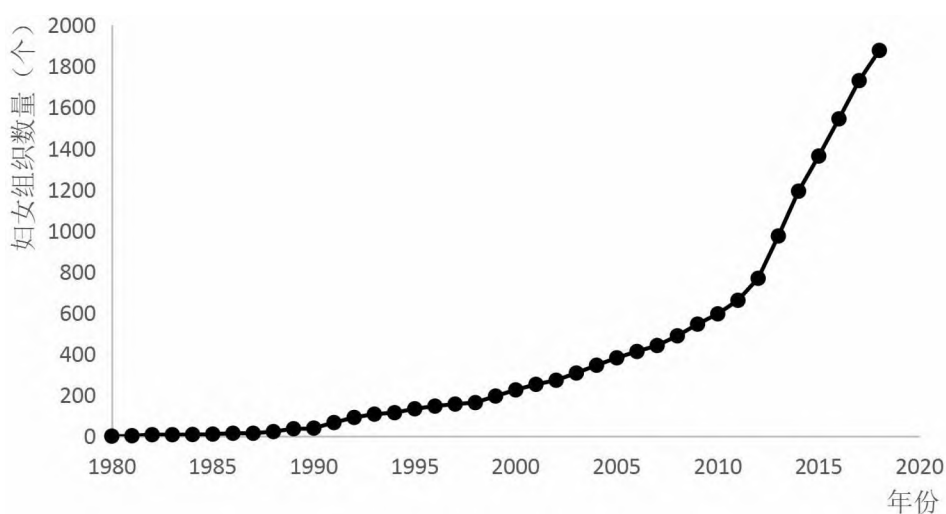


图1 1980—2018年女性社会组织的种群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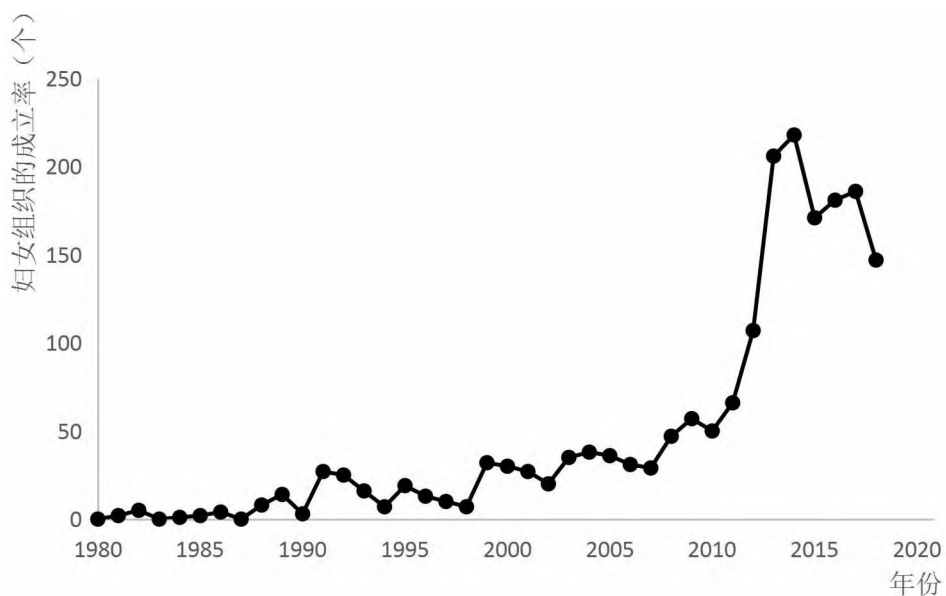


图2 1980—2018年女性社会组织的成立率

第二部分的资料主要是1980年—2018年全国的宏观数据。全国私营企业数主要通过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进行查阅,由于1988年获得合法地位前没有统一的名称,所以1988年之前的年份数据存在一定缺失;全国民政事业支出来自于历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此外,通过民政部历年来的决算报告对数据进行核对;妇女人口数量的获得相对较为便捷,数据全部通过国家统计局官网获取。

第三部分的制度环境因素两个指标获得途径如下。规则维度以1980年—2018年的女性社会组织相关法律法规为准,本文主要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及部门规章,通过北大法宝数据库收集,并通过国务院官网及妇女联合会等官网作参考;认知维度则利用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整理出1980年—2018年含“女性”“妇女”为标题的文章数量,得到这些标题出现在各大报纸上的历年

词频。

根据假设,将各个变量的数据获得途径在上文阐述,在将变量放入回归模型前,本文先进行了各变量间的相关分析,得出了相关系数表(表1)。从表中可以看出市场化程度与政府扶持力度相关度高达0.93,此外,这

两者与妇女人口的相关度也超过0.7。基于此,将市场化程度、政府扶持力度及妇女人口数进行因子分析,抽取出资源依赖因子,其中三个因变量的因子载荷分别达0.95、0.96、0.87,其中KMO为0.7。

表1 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系数

	因变量	自变量					
		密度依赖	资源依赖			制度环境	
	组织成立率	种群密度	市场化程度	政府扶持力度	妇女人口	法律法规	新公共话语
均值	48.13	402.62	527.6044	1260.6487	59761.00	22.49	1236.46
标准差	63.468	507.862	800.59606	1819.98946	6112.686	21.342	791.238
样本量	39	39	39	39	39	39	39
组织成立率	1	.921**	.886**	.886**	.710**	.755**	.595**
种群密度	.921**	1	.993**	.950**	.769**	.754**	.639**
市场化程度	.886**	.993**	1	.934**	.714**	.718**	.584**
政府扶持力度	.886**	.950**	.934**	1	.737**	.826**	.642**
妇女人口	.710**	.769**	.714**	.737**	1	.815**	.878**
法律法规	.755**	.754**	.718**	.826**	.815**	1	.740**
公共话语	.595**	.639**	.584**	.642**	.878**	.740**	1

** . 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五、模型讨论与分析

以女性社会组织的成立率 y 为因变量,以种群密度影响因素 $x_1, \dots, x_7$ 为自变量构建关于女性社会组织成立率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y = \alpha_0 + \sum_{i=1}^7 \alpha_i x_i + e$$

其中, α_0 为常数项, α_i 为偏回归系数, $\alpha_i x_i$ ($i = 1, \dots, 7$), e 为随机误差项。

通过建立多个回归模型,对1980年—2018年女性社会组织的成立率影响因素逐一进行统计分析(如表2)。

表2 密度依赖、资源依赖及制度环境对女性社会组织成立率的效应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假设一: 密度依赖	种群密度	.170*** (.025)			
	种群密度的平方	-3.420E-5* (.000)			
假设二: 资源依赖	市场化程度		.003 (.012)		
	政府扶持力度		.031*** (.006)		
	妇女人口		.000 (.001)		
	资源依赖因子			58.023*** (4.228)	
假设三: 制度环境	法律法规				2.067*** (.482)
	公共话语				.006 (.013)
	常数	-6.128(6.013)	-11.081 (48.953)	48.128*** (4.174)	-6.370 (12.822)
	调整后的 R 方	.859	.882	.831	.549

注: 1.* p<0.05, ** p<0.01, *** p<0.001。2.括号里的数字为标准误。

根据表2可以发现种群密度、资源环境及制度环境三个维度均对女性社会组织成立率有独立的显著作用。模型1主要考虑了种群密度对组织成立率的影响,据表可知种群密度对组织成立率呈显著正相关,种群密度的平方与组织成立率呈负相关。这一结论刚好支持了本文假设1中的密度依赖理论。模型1中的数据可以证实女性社会组织种群密度在达到一定程度以后,组织成立的合法化

所带来的正效应会逐步降低,组织成立过程中的竞争性则随之增加,阻碍组织密度的进一步增长。模型2将资源环境的相关因素纳入其中,在市场化程度、政府支持力度及妇女人口三个因素中,政府支持力度对女性社会组织的成立率具有正效应,而市场化程度及妇女人口则未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因此本文假设2a及2c未得到支持,而2b得到初步支持。由此可初步印证,政府支持是女性社

会组织生存的物质基础,稳定且充足的资金能够保障女性社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相反,政府支持力度的降低则易造成组织数量的下降。市场化程度与女性社会组织的发展无显著关系,原因可能与我国女性社会组织成立的特殊背景相关,即大多依靠政策引导产生而非自发形成,这一特性导致女性社会组织与市场化关联较小。妇女人口与女性社会组织成立率的关系也未体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其原因还有待进一步分析与探讨。因模型2中三个因素在表1的相关分析中显示出高度相关,进一步提炼出资源依赖因子作为三者的整合,将资源依赖因子放入模型3,对假设2做进一步检验。在模型3中,该因子与组织成立率呈高度正相关,这一结论支持了假设2。单用资源环境来解释女性社会组织的成立率还不能令人满意,在模型4中,考虑了制度环境因素,检验制度环境对组织成立的作用。数据显示出法律法规与组织成立率呈高度正相关,而公共话语维度则作用尚不显著。社会组织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为女性社会组织的设立提供了制度支持,法律法规的繁荣也是正式组织生存的必要条件。政策的正向指引是女性社会组织存在的制度基础,对推动女性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具有显著意义。变量“公共话语”反映的是妇女在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受关注程度及地位变化,随着主流媒体对妇女关注程度的增加,女性社会组织的成立率也随之增加,但遗憾的是在模型4中尚未得以体现,女性社会组织的成立率与公共话语这一维度关系并不显著。假设3a得到支持,而假设3b未被证实。

表2分别检验了三个维度自变量对女性

社会组织成立率的作用,但均是在未考虑其他变量的基础上进行的,为了解加入控制变量后新加入的变量是否仍然起到显著作用,开展了进一步研究。表3将文中自变量逐步加入统计模型,以期部分解释自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所收集数据均为历时数据(1980年-2018年),所以将“时间”作为潜在的组织成立影响因素,检验各自变量是否通过“时间”这一控制变量对因变量起到作用(如表3)。

模型5主要考虑时间变量及种群密度对组织成立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控制时间变量的条件下,组织的种群密度仍然对组织成立有着显著影响,即随着组织密度的增大,组织成立率会随之提升。但在控制时间变量后,种群密度的平方与组织设立率的负向效应被消减,据此笔者推测可能是由于现阶段我国女性社会组织的成立还处于成长期,其发育还未成熟,要达到数据上的显著还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发展。模型6将时间变量及资源依赖因子纳入其中,在此,资源依赖因子与女性社会组织的设立率呈显著正相关,资源供给的增加显著地促进了女性社会组织的成立率,市场化程度、财政支持及妇女人口增加对整个女性社会组织体系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模型7包含了制度环境维度中的法律法规和公共话语两个变量。统计结果显示,在控制时间变量后,法律法规与女性社会组织的成立率并无显著关系,公共话语与女性社会组织的成立率呈负相关关系。这一结果与未控制时间变量时差距较大,时间变量弱化了法律法规对女性社会组织成立率的正向促进作用。

表3 加入时间变量后的女性社会组织成立率回归分析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种群密度	.399*** (.059)		
种群密度的平方	.000*** (.000)		
资源依赖因子		89.014*** (11.026)	
法律法规			.649 (.546)
公共话语			-.041* (.016)
时间	-4.484*** (1.074)	-2.899** (.967)	5.881*** (1.507)
常数	8902.200*** (2132.966)	5843.300** (1933.197)	-11672.118*** (2989.404)
调整后的 R 方	.903	.861	.677

注: 1.*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2.括号里的数字为标准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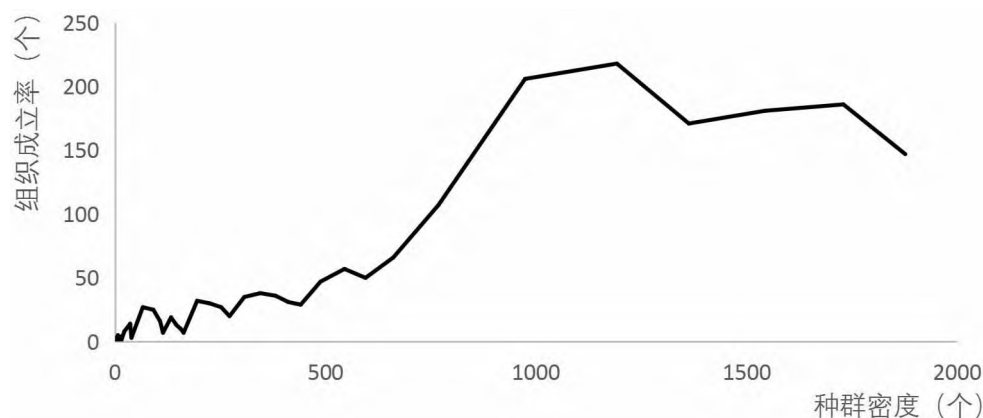


图3 种群密度对组织成立率的影响

基于以上模型,推断种群密度和资源环境对女性社会组织的设立影响较为稳定并显著。通过绘制图3将种群密度和组织成立率的关系清晰表示。种群密度与组织成立率之

间大致呈倒U型曲线,但过程存在一定波折。

当种群密度在0-600区间时,组织设立率缓慢上升;而当超过600左右时,组织成立

率迅速上升,当密度在 1000-1200 时到达顶点;在种群密度处于 1400-1700 时,组织成立率处于较为稳定的快速增长期,但较前一个阶段有所减缓;密度在 1700 之后,组织成立率明显减缓,并持续呈下降趋势。依照本文标准进行统计,目前我国女性社会组织的密度接近 2000,正处于组织演变的成熟期,因此,女性社会组织在发展的同时会放慢步伐,在之后组织成立率会持续下降,直到到达一个平衡点。

数据模型反映了我国女性社会组织成立的制度及资源影响因素,此处还将联系我国女性社会组织的典型案例进行详细说明。以妇女研究组织为例,改革开放后我国妇女研究组织兴起,在多重力量的推动下获得长足发展,主要类型包括:妇联系统的妇女研究组织、高校系统的女性社会组织、社会科学院系统的女性社会组织及其他民间妇女研究组织等。^[14]1985 年河南省未来研究会成立了全国首个妇女研究中心,随后针对妇女研究的协会或中心等相继成立,集中于 1985 年-2000 年。以 1995 年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及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为时间节点,妇女研究组织的合法性地位得到大幅度提升。21 世纪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妇女事业,在国家扶持及社会法律法规的促动下获得长足发展,大部分省市甚至区县均设立妇女研究会,妇女研究组织的数量迎来新一轮的增长。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妇女研究组织受制度环境及政策支持力度的影响,其合法性地位随着制度环境及资源提供的发展而变化。女性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妇女事业发展密切联系,女性社会组织的发展既是社会进步的要素

求,也是推动社会文明的必经之路。

六、结论

基于我国女性社会组织 1980 年-2018 年的生命史数据,本文分析了女性社会组织成立率的影响因素,分别从种群密度、资源环境及制度环境三个维度开展研究。首先,从种群密度维度来看,考量了种群密度及种群密度的平方对组织成立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种群密度对组织成立率影响显著,并验证了密度依赖理论。并通过生命史数据精确地刻画了种群密度与组织成立率之间的关系,有利于进一步分析我国女性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改革。

其次,为了考量资源环境与组织成立率的联系,将市场化程度、财政支持力度及妇女人口纳入其中,从不同角度分析资源对组织成立的影响效应。统计结果显示资源依赖因子与组织成立存在显著联系,但不可否认所构建的指标多用替代变量表示,定会存在一定偏误。

最后,本文探索了制度环境与组织成立率两者间的关系。主要考量了法律法规及公共话语这两个变量,在未控制变量的基础上,最终得出法律法规对组织成立率影响显著,公共话语变量则不明显。

女性社会组织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从侧面印证了我国妇女事业的发展历程,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的制度优越性。运用组织生态学的理论视角对女性社会组织进行探索更加指明了女性社会组织的发展轨迹,对引导女性社会组织的未来发展具有指向作用。

参考文献:

[1]张钟汝.增强民间妇女组织能力 促进社会性别和谐平等[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4).

[2]黄粹.民间妇女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析论[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4).

[3]李莉.中国妇女非政府组织行为的制度性约束及其嵌入性[J].行政论坛 2011(1).

[4]彭璧玉.组织生态学理论述评[J].经济学家 2006(5).

[5] Michael T. Hannan and John Freeman , "The Population Ecology of Organizations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 , No. 5 (Mar. , 1977) : 929-964.

[6] Delacroix J ,Carroll G R. Organizational Foundings: A Ecological Study of the Newspaper Industries of Argentina and Ireland [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83(2).

[7] Hannan M T ,Freeman J. The Ecology of Organizational Founding: American Labor Unions , 1836-1985 [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7 (4).

[8] Meyer , J. , Scott , R. , and Deal , T. (1981) . "Institutional and Technical Sources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Explaining the Structure of Organizations." In H. Stein (Ed.) , Organization and the Human Services. Philadelphia ,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p. 151 - 178.

[9]Zucker L G. Combining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Population Ecology: No Legitimacy ,No History [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9(4).

[10]Đurman , Petra. W. Richard Scott: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Ideas and Interests [J]. hrvatska i komparativna javna uprava ,2011(2).

[11]Carroll G R . Publish and Perish: The Organizational Ecology of Newspaper Industries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87(2).

[12]Barnett W P ,Carroll G R. Competition and mutualism among early telephone companies [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87(3).

[13]Miller M P. The Size of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J].Social Forces ,1983(4).

[14]仪纓.当代中国妇女研究组织初探[J].妇女研究论丛 2000(2).

特约编辑: 李 杰